

四川方言词语与汉语同族词研究

一、汉语同族词研究的简单回顾

一种语言中语音相同或相近、意义相近或相通的一些词（字、语素），聚合在一起，通过分析归纳，如果认定是同出一源，这样的词（字、语素）称为同族词。

同族词与同源词相关而有别。同源词是根据语音对应规律去追溯不同语言中具有相同源头的词，这在印欧系语言中研究得比较深入，而汉藏系语言的研究才刚刚起步。同族词是一种语言内部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因意义引申、方言分歧和语音变化而产生的音近义通的词。汉语是世界上使用人口最多，分布地域很广的语言。它的历史十分悠久，连续性很强，并且现存大量古代书面文献，同族词应该是异常丰富的。汉语的记录工具是既表意且表音的方块汉字，方块汉字从来就没有十分忠实地记录过语言（汉语方言非常复杂，而且歧异性很大），它对于汉语基本结构单位的影响，现在也不能说已经研究得十分清楚了。

词义是概括的，在交际使用时又是相对具体的。因此，词在应用中发展。从临时联想、修辞用法、语法变性，到具有社会约

定性，就形成引申义，而且会不断引申，层层引申，由此形成一个词的词义系统。当词义分枝多，层次多，本义和引申义相距很远的时候，就可能派生新词，并用文字固定下来，由此形成同族词，构成词族。就像家庭，一对夫妻可能生育若干子女，兄弟多了要分家另过，子又有子，子又有孙，由此形成家族。不过人类是每人必有老必有死，而语言中的常用词却可以存活千万年。

汉语同族词的研究，实际是对语源的追溯，也是对语词意义的溯源察流。它既可以由今溯古（不同时代有不同的今古。例如，以近现代为今，则 19 世纪中叶以前为古；以明清白话为今，则唐宋白话为古；以唐宋为今，则秦汉为古；以秦汉为今，则先秦传世文献为古；以先秦传世文献为今，则商周甲金文为古），以现代单音词或语素的音义构成去追本溯源，考求方言本字即是其中一种方式；又可以探古察今，以古代的根词或核心词（表意字或形声字声旁）为基础，去描述词族的孳生繁衍分化的过程。

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就必须对汉语词源研究的历史作一番回顾和总结。全面总结非我所能，只能作一个简单回顾。

语源的研究，最初导源于声训。声训是用语音相同或相近的词语来训释词义。这原是训诂学史上自发的、原始的训诂方法。我国的训诂学萌芽于先秦时代。在先秦经传文本对语词的训释中，声训就出现了。著名的如：

《论语·颜渊》：“政者，正也。”

《孟子·滕文公上》：“庠者，养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又《尽心下》：“征之为言正也。”又：“仁也者，人也。”

《庄子·齐物论》：“庸也者，用也；用也者，通也。”

《荀子·王制》：“君者，善群者也。”

《礼记·中庸》：“仁者，人也。义者，宜也。”又《乐记》：“德者，得也。”

《易·离·彖》：“离，丽也。”又《晋·彖》：“晋，进也。”又《说卦》：“乾，健也。”又：“履者，礼也。”

由于秦的焚书及秦汉之际的兵燹，先秦典籍丧失殆尽。汉初君臣，大多来自南方下层，与当时黄河流域的主流文化显然隔膜。废挟书令之后，人们才开始从遗老口中，从民间收藏，乃至从藏于墙壁内的残篇中去搜集整理古籍。在一个大一统的帝国中，由于存在文化的某种断层，存在古今与各地之习俗与方言的差异，在文化继承，古籍整理，乃至文化交流与建设的过程中，语言问题应相当突出。为解决这个问题，汉代训诂学蓬勃发展，声训是其中一个重要方面。董仲舒《春秋繁露》、班固《白虎通义》在这个方面都走得较远。他们的本来意愿，是以追索语源的方式，来证明与封建等级制度有关的政治、伦理、名物的天然合理性。董仲舒在《春秋繁露·深察名号》中说：“治天下之端，在审辨大。辨大之端，在深察名号。……名号之正，取之天地，天地为名号之大义也。古之圣人，謫而效天地谓之号，鸣而施命谓之名。名之为言，鸣与命也；号之为言，謫而效也。……名号异声而同本，皆鸣号而达天意者也。”这里面蕴含的声与义之间的理据说姑且不论，他看到语音相近的词意义之间存在着某种相通关系，还是触及了一定的事实的。就在这篇文章中，他对君王士民作了解释：“王者皇也，王者方也，王者匡也，王者黄也，王者往也。……君者元也，君者原也，君者权也，君者温也，君者群也。”士者事也，民者暝也。”这些被某些哲学史家斥为“一派胡言”的解释，恐怕是当时的官僚学者们的一种共识，一种对

君王的期待，一种应然的判断：王是伟大的，王是方正不偏私的，王是匡正错误的，王是居于中央的，王是能使天下臣民归往的；君是邦国之元首，君是政策之本原，君是政策是非及臣民行为的仲裁者权衡者，君是温煦因而使人亲近的，君是能使臣民群聚的。《白虎通义》中的这种声训更是触目皆是。例如《五行》：“水之为言准也。”木之为言触也。”火之为言化也。”金之为言禁也。”土之为言吐也。”又《嫁娶》：“男者任也，任功业也。女者如也，从如人也。…夫者扶也，妇者服也。”又《日月》：“日之为言实也，月之为言阙也。……星者精也。”

《说文解字》的声训也颇不少。例如：天，颠也。礼，履也。古，极也。尾，微也。田，陈也。门，闻也。户，护也。火，燬也。衣，依也。山，宣也。木，冒也。东，动也。羊，祥也。马，武也，怒也。棺，关也。母，牧也。室，实也。走，趋也。趋，走也。造，就也。如果算上声训之字夹杂在句子之中，而实际仍可看作声训的，数量就更多了。例如：名，自命也。土，地之吐生物也。房，室在旁也。王，天下所归往也。史，记事者也。教，上所施下所效也。川，贯穿通流也。班，分瑞玉也。禘，会福祭也。大合祭先祖，亲疏远近也。清邓廷桢曾作《说文双声叠韵》对此加以收录，可见其应用声训多而且广。毛氏传《诗经》郑玄注三《礼》都用过声训的方法。

到了汉末刘熙的《释名》，则是全面地自觉地用声训方法训释词义以求语源。其自序说：“夫名之于实，各有义类，百姓日称而不知其所以之意，故撰天地阴阳四时，邦国都鄙，车服丧纪，下及民庶应用之器。论叙指归，谓之《释名》。”他的声训，有一些是符合语言真实的。例如：“盲，茫也。茫茫无所见也。”

(《释疾病》)“威,畏也,可畏慎也。”(《释言语》)“山夹水曰涧。涧,间也,言在两山之间。”(《释水》)“帐,张也,张施于床也。”负,背也,置项背也。(《释床帐》)“肿,鍾也,寒热气所鍾聚也。”(《释疾病》)有极少数散见于各部分的解释,汇集拢来就是一个小小的词族。例如:“颈,径也,径挺而长也。”(《释形体》)“胫,莖也,直而长似物莖也。”(同上)“泾,径也,言如道径也,水直波曰泾。”(《释水》)“经,径也,常典也,如径路无所不可通也。”(《释典艺》)“径,经也,人所经由也。”(《释道》)颈、胫、莖、泾、经、径等字皆从丞声而以形旁别其词性和义用,音同义近,都有“长细直”的涵义,就是同族词。

《释名》声训的基本方法是从一些音同音近的字当中挑选出一个意义相关的词去解说被释词,因此无法区分是偶然同音呢还是真有同源关系,主观随意穿凿附会的比例较大,而真实可信的比例较低。

从上面的叙述可以看出,从先秦到两汉,声训已成为语言学史上探索语源的一种重要方法,虽未完善,但它触及到了词的意义内容与语音形式的关系这个根本问题,其音义必须相近的原则也已确立。这种“因声求义”的方法,对当时学者来说,是无须论证的事实,势所必然的方法,因为当时的语言就一直在“因音生义”。这些都为后人的继承和发展启示了门径。

汉代在声训的方法之外,又有“语转”之说。“语转”包括古今音转和方言音转。古今音转是词的历时性变化。方言音转则是词的共时的地域性的变化。根据现代方言学的研究,某些方言的地域性的区别,可能反映了语言的历时性区别。汉代扬雄《方言》就提出了“转语”一词,指因时地不同而音有转变的词语。

例如，《方言》卷三：“庸谓之𦉳，转语也。”又卷十：“燥，火也。楚转语也。犹齐言焯，火也。”郭璞注《方言》，也出现了声转、声之转、语转等术语。例如，《方言》卷一：“……京、奘、将，大也。……秦晋之间，凡人之大谓之奘，或谓之壮，燕之北鄙、齐楚之郊，或曰京，或曰将，皆古今语也。”郭注：“语声转耳。”按，今普通话说人曰“壮实”“健壮”，说庄稼曰“茁壮”。四川话亦如此说，但口语中凡言人与物之粗大粗壮健硕曰“奘”（上声）。又用作动词，凡添加零头使成整数曰“奘”。如：～起/～够/～秤/再～点，再～点儿。又卷五：“薄，宋魏陈楚江淮之间谓之𦉳，或谓之麴。”郭注：“此直语楚声转也。”又卷十一：“蝇，东齐谓之羊。”郭注：“此亦语转耳。”郑玄注经，亦有“声转”的术语。例如，《诗·周颂·有瞽》：“应田县鼓。”郑玄笺：“田当作鞞。鞞，小鼓，在大鼓旁，应鞞之属也。声转字误变而作田。”语转之说，是从语词的声音联系来追寻语词的语源联系，也是一种语源研究。

“右文说”的萌芽产生于晋。《艺文类聚》引杨泉《物理论》：“在金曰坚，在草木曰紧，在人曰贤。”这表明，杨泉已经感觉到汉字形声字某些声符相同的字意义可能相通。径以“右文”来指称声符，并据以系联同源词，始于宋代。沈括《梦溪笔谈》卷十四：“王圣美治字学，演其义为‘右文’。古之字书，皆从左文。凡字，其类在左，其义在右。如木之类，其左皆从木。所谓右文者，如戔，小也，水之小者曰浅，金之小者曰钱，歹而小者曰残，贝之小者曰贱。如此之类，皆以戔为义也。”宋人王观国《学林》五、张世南《游宦纪闻》九、戴侗《六书故》皆曾道及，不仅根据声符考察了一些同族词，而且对声符载义的原理的认识也有所前进。右文说使语源研究从

单词溯源转入了系列探索。

到了清代，语言文字之学大为兴盛，出现了一大批作出了卓越贡献的学者。戴震、段玉裁、王念孙、程瑶田、朱骏声等，都为汉语同源词的研究作出了远迈前人的贡献。

清代的学者既是训诂大师，又是古音学家。他们有简朴的语言学理论，有坚实的古音研究成果，有不懈地训释古典文献的实践及深厚功力，有全面整理和注释古籍的实绩。他们对记录汉语的汉字形音义三者之间的关系，有相当清醒的认识，其基本理论，来自对汉唐语言学家的观点的继承。在语词音义的关系方面，音是根本是关键的观点，在中国学术史上，可谓源远流长。汉代郑玄说过：“就其原文字之声类，考训诂，捃秘逸。”（见贾公彦《序周礼废兴》）唐代孔颖达说：“言者意之声，书者言之记。”（见《尚书·序》正义）唐代顾齐之《慧琳一切经音义序》：“得其音则义通，义通则理圆。”明末方以智《通雅》：“欲通古义，先通古音。”“因声求义，知义而得声。”顾炎武《答李子德书》：“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这些说法虽不系统精密，但却一脉相承，逐渐明确。清代学者们近似的说法是大量的、明确的。戴震《六书音韵表序》：“故训音声相为表里。”《转语二十章序》：“疑于义者以声求之，疑于声者以义正之。”段玉裁《广雅疏证序》：“治经莫重于得义，得义莫切于得音。”在《说文解字注》的注释文字中，散见于各字头下的“以声为义”的议论相当多。例如“禛”字注：“声与义同原，故谐声偏旁多与字义相近。”“晤”字注：“同声之义必相近。”王念孙《广雅疏证序》：“诂训之旨本于音声。故有声同字异，声近义同。虽或类聚群分，实亦同条共贯。譬如振裘必提其领，举网必挈其纲。”

“就古音以求古义,引申触类,不限形体。”这些学术观点,指导了他们的训诂实践,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朱骏声以声符为纲重新编排《说文》的方法,会使阅读者产生强烈的音近义通的感受。

到了民国时代,章太炎、杨树达、沈兼士等人把汉语语源研究又向前推进了一步。他们对传统学术有很深的功底和极好的领悟,又都在国外居留过,受到西方语言学的影响。他们都是既有同族词系联的实践操作,又有理论的探索。沈兼士《右文说在训诂学上之产生和发展及其推阐》、杨树达《形声字声中有义略证》《文字孳乳之一斑》等文,推寻语词在形音义诸方面的演变轨迹,揭示了汉语语言文字产生和发展的一般规律。值得一提的是,章太炎有《新方言》,杨树达有《长沙方言考》及《续考》之作。他们研究方言语词的实际经验,对于深入探索语言词汇的发展和意义的引申分化,必然会起到良好的推动作用。

20世纪80年代以来,汉语语源研究成为汉语史研究中的热门。王力、刘又辛等老一辈学者在理论探索与词族系联的实践上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任继昉的《汉语语源学》(重庆出版社),殷寄明的《汉语语源义初探》(学林出版社)的理论探索,张希峰的《汉语词族丛考》及《续考》(巴蜀书社)的同族词系联,也都是好学深思之作。一些文字学著作也涉及了语源问题。裘锡圭的《文字学概要》、詹鄞鑫的《汉字说略》都有专章或专节论述语源问题。训诂学著作的“因声求义”的章节,也是讲这个问题的。这表明,汉语语源的研究已经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我认为,研究汉语同族词,应该用联系和发展的观点,从词义引申文字分化语音演变的历时角度,来分析汉语汉字系统内部错综复杂的关系。这种历时的研究中,要充分利用现代方言口语

材料。正是基于这种想法，本书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探讨。

二、语源与思维关系的检讨

语言是人类思维的工具，也是人类思维的产物。语言是人类交际的工具，也是交流思想的产物。它与人类文化人类思维方式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因此，德国语言学家洪堡特所说的“每一语言都已包含着一种独特的世界观”，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论断，它把语言和思维之间的密切联系表述得十分清楚。我们学会一种语言，实质上就是学会一种观察世界的角度和认识世界的方法。

在语言起源的问题上，一个词的音义结合是任意约定的，还是有道理可说的？学者们的争论是很激烈的。在这个问题上，目前大家较能接受的是沈兼士先生的说法：“凡义之寓于音，其始也约定俗成，率由自然，继而声义相依，展转孳乳，先天后天，交错参互，殊未可一概而论。”（见《沈兼士学术论文集》，《声训论》）因为古汉语词语和现代口语当中音近义通的现象太普遍了，令人无法否认。

马克思说：“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伽达默尔说：“语言先于思想。”语源的研究，可以为研究人类思维的发展演变提供必要的证据；而人类思维发展演变的研究，则是研究语源的必要条件之一。

大体而言，人类思维总是发展的，从模糊到清晰，从具体到抽象，又从清晰到模糊，从抽象到具体，循环往复，辩证发展，螺旋式上升。而人类语言结构也相应地从简单到复杂，语词数量由少到多地发展着。

马克思很赞赏的意大利哲学家维柯，对形象思维的进行程序作了两条概括：一是以己度物的隐喻，二是想象性的类概念。他认为，原始民族都用形象鲜明突出的个别的具体的事物来代表同类的事物。这种从个别来认识一般的方法，所依据的是关于人类的心理活动的一条原则：“每逢人们对远的未知的事物不能形成观念时，他们就根据近的可见的事物去对它们进行判断。”原始人仿佛是些人类的儿童，由于还不会形成关于事物的通过理解的类概念，就有一种自然的需要，这就是形成想象性的类概念或普通性相（一般），把它作为一种范型或理想的肖像，以后遇到和它相类似的一切个别事物，就把它们统摄到它（想象性的类概念）里面去。”（维柯《要素》，转引自朱光潜《西方美学史》1997年版上卷，342—343页）

伍铁平曾说：“古老性和语言的模糊性是成正比的。”（《语言的模糊性和词源学》，《外语教学》1986年1月）在为本来是“世界上没有完全相同的两片叶子”的林林总总的事物命名的过程中，原始人往往求同存异，抓住事物的共同的或相似的或相通的性状特征，分类来为事物命名。可以设想，初时语言的音节会相当少，发音也必然含糊。正因为音节含混模糊，所以发展变异的可能性就相当大。随着时间的推移，语言的音节会增加，也会逐渐清晰明确。与此相应，音节所表示的语词及其意义也会逐渐明确清晰且数量增加。这些增加的语词，大多不是无中生有突然产生，而是原有的词语分化孳生的。这大体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自然界或人类生活中原有的事物，在语言中本是模糊反映的，随着人们对它的认识的明确与深化，其所代表的事物会有所区别，语言也可能相应地分化。另一种是新发现的事物或人新创造

的事物，人们在为之命名时，同样是抓特征，求相似，引申触类，从已知推未知，以此事物之名命彼事物之名。这种由此及彼，从已知推未知的认识规律，不仅体现在人类认识的初始阶段为具体事物命名，在人类认识的高级阶段为抽象事物命名时也有所体现。但是，客观事物本身具有多种属性，在运动发展变化时也会呈现多种状态，人们对事物及其变化的认识也不一定采取一个固定的角度，这就使意义的呈现和人们对意义的解释，都会有某种不确定性，乃至变异性。

例如，瓜是圆的，果是圆的，瓜果的花在未开放时（蓓蕾花朵）也是圆的。民以食为天，跟食物有关的植物花果应该是人类最早认识并为其命名的事物之一，大约是读 [koa]。稍后人们会认识到瓜果花的区别。再进一步，瓠（葫芦）是圆的，芋头是圆的，人造的壶是圆的，人造的鼓是圆的，人造的车车身不一定圆，但其主要部分（轮毂轴）均是圆的。瓜 [koa]，果 [kua]，花 [xoa]，瓠壶 [va]，芋 [viwa]，鼓 [ka]，车 [kia]（用郭锡良所拟古音），读音何其相近！而且，根据现在同源词研究的结论性意见，古代的联绵词往往有相对应的音近义近的单音节形式。例如：葫芦、壶卢、浑沦、昆仑、括楼、栲栳、骷髏、佝偻、窟窿、穹隆、廓落、喉咙、果蓏、骨碌、囫囵、块垒、坷垃、傀儡、克郎、甘蓝等，它们的声母都是 g—l—或 h—l—，存在音转关系，在意义上都含有浑圆之义。如果再加上音转为其他形式而意义相近的联绵词，这个词族就庞大了。

人的意识，大体经历了从具体到抽象，再具体又再抽象的辩证发展过程。大约人类认识的初始阶段，总是先认识各形各色的具体实物，积之久则会发现各色各形的具体之物有着某种共同的

特征。例如，瓜果都能吃，所以特别注意，瓜果都是圆整的，于是抽象出圆转的观念，并用与瓜果相近的音去为一些新发现的或人造的圆整之物命名。例如：花、瓠、芋、鱼、车、鼓、壶、锅、弧，这些都是名词。如果加上声音能通转的一些动词形容词及其所分化的词，例如圆、滚、回、环、卷、军等，那就不知凡几了。其实这些东西的所谓圆转，只是一种大略的近似的“圆”，分析之，有球体之圆，有柱锥之圆；有平面之圆，如浑圆椭圆；有线条之圆，如弧圈之圆。有静态之圆形，有动态之圆转。此外，大体完整的块状物也可称圆。

这就必然导致人们认识的深化，导致语词意义的引申、分化、复杂化和系统化。那么，人们为什么对圆转如此着迷？美国文化人类学家和社会心理学家史密斯认为：圆圈以及具象——轮子是最富于哲学意味的原型象征，由于圆圈中的开端和结尾是同一的，形式简单而且完整，因此被认为是最完美的形象；轮子有辐条而且还会转动，轮子的辐条被认为是太阳光线的象征，生命之源来自中心，因此被看作是创造力的象征。又因为轮子旋转时其轴心是固定的，转圈运动是完全规则的，因此人们把这种特征象征为真理，即是寻找人的经验和活动的稳定秩序。人类最初的语言就是由这些具有鲜明形象的原型性象征组成的，人类的思维和自我就是依赖于丰富多彩的隐喻和象征开始发展的。这反映了人类共同的思维心理过程。（转引自任继昉著《汉语语源学》62页，重庆出版社1992年版 钱锺书先生在《管锥编》、《谈艺录》中，评述了古今中外的人们对圆的正反褒贬的认识，可谓打通而辨析之，实在令人心折。钱先生的成就，昭示了词汇研究要注意分析其异，更应注意圆通求同。

新词产生之后，又是一个有生机的个体，意义有引申有变异，有分化（还有组合），读音有历史变异有方言歧异。至于这些词的读音的原始来源是象声（类似“骨碌碌”），还是惊叹（近于[va]），现在已不易论证；它的最初形式是复辅音，还是双声叠韵的双音节，还是单音节，复辅音与单音节之间关系又是怎样的，现在也不易论证了。毕竟，在记载这些词语的文字产生之前，语言已存在几万年了。汉字又不是拼音文字，不能准确记录读音，而且汉字的历史也有三千多年了。我们现在所掌握的古音，是根据古代韵文，谐声偏旁，古音通假等材料归纳分析，根据《广韵》逆推，再利用现代方言构拟的。它没能考虑古代方言的因素，也没能考虑某些字的读音可能发生突变的因素。再举一些语源义为“分”的词的例子。上古声母是帮组的字，很多都有“分”义。以《说文》所收的字为例：

八，别也。象分别相背之形。帮母质部。

分，别也。从八从刀，刀以分别物也。帮母文部。

𠂇，分也。从重八；八，别也，亦声。《孝经说》曰：“故上下有别。”按，从《说文》引《孝经说》之例来看，别𠂇应为异文。帮母月部。

必，分极也。从八弋。帮母质部。

半，物中分也。从八从牛。牛为物大，可以分也。帮母元部。

采，辨别也。象兽指爪分别也。读若辨。按，此字古文作，番字古文作，将番字古文右转 90 度，则与采字极相似。又“𦉰”字释为“小蒜”，义当为蒜瓣。《玉篇》《广韵》皆云“百合蒜也”。盖蒜有独头蒜，有“兄弟四五个，围着柱子坐”之蒜。今四川方言把蒜瓣小而围得紧密的蒜称为“狗牙巴蒜”；“巴”字读

儿化，听来极似“瓣儿”。古音帮母元部。

别，分解也。从𠂔从刀。帮母月部。

片，木也。从半木。滂母元部。

北，乖也。从二人相背。帮母职部。

辰，水之邪流别也。滂母锡部。

上述十文，乃象形指事会意等表意文字，由这些字作声符的形声字而有“分”义的，有一大批。例如贫（分财）、欸（分也）、盼（目黑白分明）；叛（半也）、判（分也）、畔（田界分界）、胖（半肉体）、版（判也）；背（本义为背脊，背部。败北就指背向阵地逃跑。背离指离开，避开）；派（辰本指水之分支支流，派为孳生字，取代辰。用作动词，表示分配分派）、脉（本从血从辰，指血脉，血脉有分支。又作从肉辰声）緌（散丝也）；播（分布，散播。播为帮母歌部）、藩（藩篱用于分内外，藩镇屏藩本是从中央分离出来起保护中央的作用的）；颁（本义为大头，常用义颁布乃分发出去）。

还有一些虽未直接释“分”，但分析一下，仍有“分”义的。如辩，罪人相与讼也。治狱讼时罪人要争辩分辩，官长须分辨办理。並母元部。从辩得声的：

辨，判也。从刀辩。后又从力，孳生为“办”的繁体。

瓣，瓜中实也。查按即瓜瓣。

辩，治也。争辩，分辩。

辨，交也。打辫子先分股后交织。

反，《说文》释义为“覆”，杨树达认为是“扳”（攀）的初文，攀援的结果或翻越，或返回；钱锺书释“反”为违反、回返之相辅相成。无区别则无相反，造反（叛变）是从群体中分裂出

去。帮母元部。

辟，法也。律法为君主所制定，所以区别正与邪，罪与非罪，惩治邪罪。帮母锡部。

从辟得声的劈（破也），擘（搗也），闢（开也，使闭合的门分开），臂（躯体分枝），皆有“分”义。

还有一些声母是帮组的形声字，明显地具有“分”义：

剖，判也。滂母之部。

副，判也。滂母职部。

牖，判也。滂母职部。

发（發），射发也。射箭乃使矢离弓而去。帮母月部。

拔，擢也。擢拔使离开原处。並母月部。

下面三字，是会意字象形字，声母是帮组：

班，分瑞玉也。从珣从刀。帮母元部。

剥，裂也。从刀从录。帮母屋部。

卜，灼剥龟也。象灸龟之形。一曰，象龟兆之纵横。查按，卜乃占卜时所灼龟甲之裂纹，裂纹是分开的，“卜”又是个象声词。帮母屋部。

上面的数十字，都可以说有“分”之义。细分起来，有剖分之分，有分裂之分，有分离之分，有分散分布之分，有区分分别分辨之分，但都是分。它们的声母都是帮组，韵部有歌月元部，文部，之职部，质部，锡部，屋部。《说文》所收录的帮组字有“分”义的，肯定还有一些，《说文》之后记录和产生的字也肯定还有一些。如此众多的例证说明它们决不是偶然的。我们前面说的语音从含混到清晰，意义从模糊到明确，在动词性词语当中也许表现得更明显。上面这些例证，充分说明人类思维和语言都是

从简单走向复杂，从含混走向明确清晰，也充分说明汉语词语“声中有义”是一种规律性现象。正因为这样，对汉代学者来说，“训诂之旨，本于声音”，乃是无须论证的事实，势所必然的方法。因为，当时的语音也许天天都在“因音生义”。

在认识这些词语的音义关系时，还要考虑下面一些因素：从有声语言产生到汉字成熟（甲骨文）至少有几万年，从甲骨文到东汉也有千多年；周取代殷商后，黄河流域一带各种语言、方言的交流融合；古今音变，方言分化；周边少数民族语言的影响。汉代的学者们在整理古籍文献、解释文字意义时，就已经感觉到了语言的复杂性，古文籀文等概念的提出，表明他们已经认识到新字、新词的产生均非一时一地。在扬雄、许慎两千年之后的今天，我们更应该认识词语音义关系的复杂性。

詹鄞鑫在《汉字说略》一书中有一个观点：所谓本义，是汉字在造字时通过形体来表现的它所代表的词义，只能从字义的角度而不是从词义的角度来谈本义，而且是先有抽象性语源义，后有具体性造字本义（《汉字说略》，230—238页，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这是很有启发性的。这种抽象性意义，可以从一个常用字的诸多存在着引申关系的义项中概括出来，也可以从若干声音相同相近、意义相近相通的词语中概括出来。

关于许慎《说文叙》对形声字下的定义“以事为名，取譬相成”的理解，也可以说说。王凤阳先生在所著《汉字学》中翻译许慎定义时这样写到：“找个与事物名称的读音相同的字来标音，再根据事物的属性分类找一个字比并于旁边，两者共同组成一个字用这种方法造的字叫‘形声’。”（《汉字学》340页，吉林文史出版社1989年版）他从来源上将形声字分为三类：同形（或

形近)分化形声字,音同(或音近)分化形声字,同源分化形声字。他批评了传统文字学者认为“形符主义”的观念,批评了传统认为以事为名的“事”是指形符的歧解。(同上,436—451页)他在为张希峰《汉语词族续考》作的序——《汉语词源研究的回顾与前瞻》中,再次强调了这一观点。我认为王先生的说法是正确的。

人们常说,文字有限而词汇量无限,这是就词汇积累的总量来说的。每一个时代的常用字或常用词都不会很多,一个具体的人所掌握的常用词就更有限。可以设想一下,在文字产生之前,人们口语中的音节恐怕是很有限的,后来被认为是不同的语词的,当时未必就已经清楚地分化出来了。语言和文字的发展都是一个过程。时代在发展,生活在更替,人们在交流。不同语言,因交流而融会。交流时,可能有误解,又由误解而生新义。误解有时还是妙解。我在一个相当偏僻的山沟里当过几年知青,当地农民的语言,一方面很生动形象,有很多妙喻和双关现象;但另一方面也相当贫乏,很多语词没有相应的书面记录,很多书面上的语词和字词典中收录的语词他们实际都不说。总的说来是词汇量显得相当少。我在大学里待了近三十年,也能接触一些词汇相当贫乏,平时只操教科书用语和报刊用语的知识分子。想一想,实际生活中,平常有几个人像中央电视台的播音员播音时那样说话?大道多歧,人们在日常交际中也只是“心知其意”罢了。

语词的这种由含混笼统到清晰明确的发展变化,形成了词族。词与词之间的音义联系,有些是清楚的,有些则已晦而不彰,需要探究和解说。

一种语言的词语的音义有联系有分化,从一到多,这是语言